

汉语对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语音与词汇的共同影响
**Influences of Chinese on the Phonology and Lexicon of Salar
and West Yugu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马汀楠，青海民族大学*

Ma Tingnan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ansu-Qinghai Corridor serves as a typical region featuring long-term multi-ethnic cohabitation and intensive linguistic contact. The Salar language and Western Yugur language belong to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Turkic language family. Through sustained contact with Chinese, both languages have absorbed massive Chinese loanwords, triggering parallel evolutions in their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systems. Taking Chinese loanwords in Salar and Western Yugur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adopts descrip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tical methods to sort out a series of shared transformations brought by Chinese, including phonological adaptation, lexical shifts and lexical renewal. It further dissects the areal linguistic features formed among Turkic languages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under Chinese influence,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research on linguistic contact among minority languages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Salar language, West Yugur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 Ma Tingnan,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qhmuqygb@163.com; ORCID: 0009-0004-3623-8333.

摘要：甘青走廊是多民族长期杂居、语言频繁接触的典型区域。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分属突厥语族不同语支，在与汉语持续接触的过程中吸纳大量汉语借词，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系统随之发生共性演变。本文以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为研究对象，运用描写与对比分析法，梳理汉语对二者带来的语音改造、词汇更新等一系列共性变化，剖析甘青区域突厥语族语言受汉语影响形成的区域语言特征，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提供实例参考。

关键词：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语言接触与变化

引言

语言区域及其区域特征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接触语言学（尤以区域语言学为代表）、历史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论题。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个体语言使用者或是语言社群同时熟练掌握、并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现象语言接触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部分语言特征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发生跨语言传播，进而形成“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语言区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同一地域内分布的不同语言之间形成结构层面的共有特征点（Harris, A. C. & L. Campbell, 1995: 122, 137; Thomason, S. G., 2001a: 62, 69-71; 吴福祥, 2020: 21(4), 23-33）。近年来，语言学界讨论较多的甘青语言区域，属于典型的区域性小型语言区域；该区域汇集突厥语、蒙古语、汉语、藏缅语等不同语系语种，长期混居交融，各类语言相互影响，逐步形成诸多跨语言共享的结构特征，是研究区域语言接触演变的典型样本（吴福祥, 2025:(2), 45-56）。

甘青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交汇地带，既是“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区域，也是汉、藏、蒙古、突厥等多民族语言文化长期接触交融的前沿地带。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前者归乌古斯语支、后者属回鹘语支；

撒拉语主要通行于中国青海、甘肃及新疆撒拉族聚居区，西部裕固语集中使用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二者虽分属突厥语族不同语支，但长期与汉语密切接触，语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相似特征。

语言接触最直接的表现是词汇借用，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是民族交往历史在语言层面的直观反映。自古以来，汉语与突厥语之间便存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已有研究证实，早在公元8世纪，古突厥语中便已出现汉语借词，且这类借词的语音形式与同期中古汉语高度吻合，充分印证了汉语与突厥语族的语言接触拥有极为久远的历史。近现代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族际交流扩大、汉语在教育与公共领域普及，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数量明显增多，覆盖范围从日常生活延伸至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界针对甘青地区突厥语族语言的共性特征已有部分探讨，但具体到汉语借词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大多局限于单一语种的独立考察。其中，学界对撒拉语汉语借词的语音、词汇及语法演变已有系统讨论，如马伟（2009）探讨了撒拉语与汉语的接触导致撒拉语的变化；舍秀存（2015）在循化地区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指出撒拉语长期与汉语方言的接触和磨合，撒拉语的结构和语言使用发生了变异；陈宗振（1985）在论文中，主要探讨了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并与维吾尔语进行了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突厥语谱系划分与语言亲属关系梳理，较少关注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在汉语长期影响下形成的共性演变特点。

总体而言，专门将两种语言结合起来、对比分析汉语对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共性特征的研究仍较为匮乏，难以突出突厥

语族语言与汉语接触互动形成的区域特征。基于此，本文从汉语对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语音与词汇影响的共性层面展开研究，运用描写法与对比分析法，梳理汉语带来语音及词汇层面的变化。

1. 撒拉语及西部裕固语与汉语的接触

撒拉族和裕固族及其先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语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古代碑铭文和回鹘文中出现的汉语借词，是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汉语对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 Tekin, Talat 的研究，早在 8 世纪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噉欲谷碑》中，就已经能看得到汉语借进古突厥语的词汇了，这些碑铭除了几个汉语人名外，还有一些地名、称谓、官位的称呼，例如 Šantung “山东”（《阙特勤碑》南 3，东 17）；kunčuy “公主”（《阙特勤碑》北 9，东 20），tinsi “天子”《噉欲谷碑》第二碑，西 9，南 2，南 3），Totok “都督”（《毗伽可汗碑》东 25，南 10，（《阙特勤碑》北 1，东 31，东 32，东 38）等词（Tekin, T. 1995; 徐丹，2015: (2), 23-35）。11 世纪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编撰的《突厥语词典》中，也记载了一些汉语借词，例如 qunčuy “公主”（卷 3：235），yinču “珍珠”（卷 3：27），tīngla- “听”（卷 3：395）等等（麻赫穆德·喀什噶里，2002）。此外，克劳森在其专著《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Clouston, G, 1972）中，也纳入了数量不少的汉语借词，例如 men “面”，kabin “嫁妆”，ka “家”，kuy “闺”，čaw “钞”，čl:g “尺”，čl:n “真”等汉语借词。由此可见，早在唐朝，中原王朝已与一些北方游牧民族通过政治联姻、军事联盟、朝贡贸易等建立频繁的联系，汉语词汇随双方交流进入突厥语族语言中。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覆盖日常生活、生产器具、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汉语在撒拉族和裕固族地区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撒拉族和裕固族人兼通汉语，在学校教育、公共事务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汉语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这进一步加深了撒拉族和裕固族群众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也促进了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语对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但本文主要试图讨论汉语对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影响。

1.1.汉语对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语音方面的影响

从语音层面分析，长期的语言接触使汉语对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的语音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汉语的主要作用下：

1.1.2 辅音音位/f/的出现与增多

古代突厥语缺乏唇齿擦音 f，外来词中的 f 通常会被替换为双唇塞音 p。在长期语言接触过程中，突厥母语者难以准确发出外来词中的 f 音，通常会依照本土发音习惯，将 f 规律性替换为发音部位相近的双唇塞音 p，以此完成外来词语音的本土化改造。这一古老的音系代偿规则并未随着语言更迭彻底消失，在土库曼语、维吾尔语等诸多现代突厥语族语言中仍保留大量活态遗存。典型用例广泛见于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多源借词之中，例如阿拉伯语常见女名 fatma，在土库曼语、维吾尔语中普遍读作 patma；汉语借词 fung “分”、mofang “磨坊”，维吾尔语本土读音分别为 pung、mopang；俄语借词 famile “姓”、fabrika “工厂”，口语中也常读作 pamile、pabrika 等等（赵相如，朱志宁，1985：8）。关于古代突厥语的 f 音位特征，耿世民在其著作《古代突厥语语法》（耿世民，魏萃一，

2010:77) 中明确指出, 古突厥语原生音系本无 f 音, 该音仅零星出现在粟特语等外来借词当中, 如粟特借词 *fryšty* (天使), 进一步印证了 f 属于外来衍生音位、而非本土原生音位的语音事实。

陈宗振在论文中提到, 与汉语的接触使西部裕固语中多了 f 这个音位 (陈宗振, 1985:(1), 206-214)。我们在明花乡和莲花乡调研时发现发 f 音的词均为汉语借词, 无一例外, 笔者发现雷春选编著的《西部裕固汉词典》(雷选春, 1992) 中, 以 f 音位开头的词汇均为汉语借词。在笔者的母语撒拉语中, 音位 f 的出现范围有限: 除借入的阿拉伯语词汇, 如 *kafir* “异教徒”、*fatima* “阿拉伯语女名”, 以及与土库曼语 *arpa* 同源的 *arf a* “大麦”外, 其余含音位 f 的词语, 几乎都为汉语借词。捷尼舍夫认为, 撒拉语中的 f 音位是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汉语借用而来的, 而且撒拉语中只有一对擦音具有清浊对应关系, 便是 v-f。(捷尼舍夫 2014:32)。

1.1.3 出现复合元音

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中都出现了 [iə]、[iu]、[ua]、[ue]、[uo]、[ye] 等复合元音。受汉语影响, 加上这些复合元音与借入语言自身的适配及融合, 它们不仅成为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元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更成为甘青地区突厥语族语言区别于其他突厥语族语言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1.1.4 出现舌尖后音

在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中, 舌尖后音 zh、ch、sh 并非是两种语言的原有音位, 而是在长期与汉语接触过程中, 伴随汉语借词传入而出现的语音现象。随着汉语词汇,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 各个领域的汉语借词大量涌入, zh、ch、sh 逐渐成为其语音体系的补充成分, 且主要集中在汉语借词中使用, 成为汉语

对两种语言语音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语言接触对语音层面的塑造作用。

1.1.5 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绝大多数突厥语族语言中，浊塞音、浊塞擦音会与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擦音形成对立。而地处甘青地区的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则有所不同，它们的塞音和塞擦音均为清音，并无浊音；同时，二者的清塞擦音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可借此区分词义（钟进文，1997:(04),55-60）。这一特征，也成为甘青地区这两种突厥语族语言有别于新疆地区其它突厥语族语言最大的特点之一。例如撒拉语 bo “伯父” -po “炮”，dam “墙” -tam “淡”，gon “皮子” -kon “宽”，jilli “刺” -čilli “咬”等；西部裕固语 bo “宝” -po “枪、炮”，dayla “戴” -tayla “抬”，gang “缸” -kang “炕”，jio “轿” -qio “桥”等。

1.1.6 同音词的出现和增加

由于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没有声调，在汉语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声母与韵母相同意义不同的同音词，这种词随着汉语影响的加深变得越来越多。例如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的 ba “把、八、吧”；pen “盆、喷”；hua “画、划、划”；dang “当、党、档”；ben “本、笨”；jia “价、甲、假、夹”；bao “报、包、保”；zhang “张、涨、章、胀”等等，这类同音形式可对应多种不同语义意向，实际使用中需要依托上下文语境，才能精准判别具体所指含义。

1.1.7 元音和谐的弱化

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元音和谐是核心语言规则，主要通过“舌位前后”和“唇形圆展”两大维度约束词内元音，确保词根与后缀属于同一类别，以保持发音和谐一致。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元音和谐以舌位和谐为主，词干与后附加成分的和谐已

不够严整。陈乃雄认为“元音和谐的宽、严、存、亡在很大程度上恰巧是取决于有关语言的元音系统和元音对应关系的变异性质和变异程度”（陈乃雄，1990:(3),16-25）。在汉语的长期影响下，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的语音系统持续发生变化。无论是元音音位的组合与分化，还是固有词内部音素的重新调整，都让原本的元音和谐律难以适配新的语言环境，最终导致这两种语言中的元音和谐现象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态势。尤其是新借入的汉语词汇，其自身的音节特征比较明显，基本不受这两种语言中原有的元音和谐规律制约。例如两种语言中的 guojia “国家”，zhengse “政策”，tuenjie “团结”，kexui “开会” 等这样的词随着汉语借词的大量涌入，使脱离元音和谐约束的词汇占比显著提升（舍秀存，2015:41(04),118-127）。

1.1.8 固有词语与汉语借词并用

汉语借词进入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词汇系统，与固有词并存并用。这既保留了民族语言的独特性，也体现了其随社会发展的灵活性与包容性，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语言体现。但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的基本趋势是汉语借词逐渐替代固有词，例如：

汉语	撒拉语固有词	汉语借词	汉语	西部裕固语固有词	汉语借词
炕	soġu	okang	褥子	tüsenjik	ruzi
坐	otur	zoġze	门帘	ye va	menlenzi
归还	yender	xolle	秤	dahrtgeš	cheng
淹没	qom	melli	葡萄	üjüm	puto
胡同	tumar	xangdo	铁匠	demerji	tiejang
庄稼	ixen	jonggi	正月	aq aj	zhenyüer

2. 汉语对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词汇方面的影响

除古代突厥碑铭与传世史料所见早期汉语借词外，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可依据借入时段划分为两大层级：其一为早期汉语借词，是撒拉族、裕固族先民东迁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借入、保留古汉语语音与词义特征的词汇。其二为现代汉语借词，这些汉语借词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是撒拉族与裕固族民众日常交际中高频使用的常用词汇。相较于同属突厥语族的其他亲属语言，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吸纳的汉语借词数量更为丰富，这类词汇现已深度融入两套语言系统，成为其词汇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2.1 早期汉语借词

我们通过对借词的系统梳理发现，两种语言中的早期汉语借词数量和领域，显著少于近现代以来的借词规模。且早期的汉语借词中并没有出现 zh、ch、sh 三个声母，说明当时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在吸收汉语借词时，汉语还未产生 zh、ch、sh 的音；早期的汉语借词“刚”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都读为 jang，说明早期汉语中 g 读作 j，马伟也指出撒拉语早期的汉语借词 jonggi “庄稼”，kan “件”，len' gi “连枷”在普通话里读 j，但是撒拉语中都发 g 或 k 的音（马伟，2009：35（03）：29-35）。这些现象正是早期汉语遗留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真实语音面貌。

2.2 近现代借入的汉语借词

自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汉民族与两民族交往频次的大幅提升，大量汉语词汇被借入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中，成为两种语言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2.2.1 行政、政治类：

darin-darin “大人”，zhuši-zhuši “主席”，zhenfu-zhenfu “政府”。

2.2.2 称谓类：

dayizi-dayizi “大姨子”，uaishen- uaishen “外甥”，shifu-shifu “师傅”，“sunzi-sunzi “孙子、孙辈的”。

2.2.3 动物、植物类：

sunshu-sunshu “松鼠”，dašang-dašang “大象”，jüxua-jühuar “菊花”。

2.2.4 度量类：

mi-mi “米”，jin-jing “斤”，dun-dun “吨”，mu-mu “亩”。

2.2.5 食物、蔬菜类：

sey-sey “菜”，doufu-doufu “豆腐”，jangyou-jangyou “酱油”，mogu-mogu “蘑菇”，douya-douyazi “豆芽”，tangmen-tangmen “汤面”。

2.2.6 医疗、教育类：

iyüen-iyüen “医院”，shoushu-shoushu “手术”，šüešo-šüešo “学校”，loshi-loshi “老师”。

2.2.7 军事、科技类：

po-po “枪，炮”，tank-tangkə “坦克”，shouji-shouji “手机”，dienshi-dienshi “电视”。

2.2.8 生活用品类：

shafa-shafa “沙发”，banding-bandeng “板凳”，shabu-shabu “纱布”，ča-ča “茶”。

2.2.9 动作、行为类：

bola-bola “包”，fala-fala “发”，pipin et-pipingna “批评”。

2.3.0 功能类：

jang-jang “刚”，šen-šen “先”，genben-genben “根本”，
dodi-dodi “到底”

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中的汉语借词分布极为广泛，语义覆盖社会生活、生产劳作、日常交际等诸多领域。受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在各语义类别中选取部分典型例词予以列举分析。总之，汉语借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大量借入与常态化使用，直观反映出撒拉族、裕固族与汉族长期毗邻杂居、深度互动交融的历史格局，也充分印证了河湟多民族区域文化互通、语言互渗的深度与广度。

2.3 汉语借词借入方式

在各类汉语借词中，按照借入方式来看，音译词数量占比最高，居于主导地位，此类借词在语音形式上遵循汉语发音规律，同时完整保留原词语义，实现了语音与语义的同步借用。除音译词外，汉语借词进入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的主要方式还包括以下几种：

2.3.1 意译：

只吸收汉语的意义部分，而不借用语音形式，再利用撒拉语或西部裕固语本族语的构词材料构成，遵循本族语言的构词规则，利用已有的语素组合成新的词汇，能从字面大概了解其意义，与所表达的概念有直接的语义联系，例如 dimuryol-demuryol “铁路”，xaybağ-xaybağ “鞋带”，这类词汇多为老一辈人或农民所使用，随着汉语的普及，如今它们几乎已被通用汉语词汇所取代。

2.3.2 半音译半意译或半意译半音译：

这类词一部分采用音译，直接采用汉语词的发音，另一部分采用意译，根据汉语词的含义用撒拉语或者西部裕固语的语

素进行翻译，将两种语言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例如 gara šatang-gara tang “红糖”，zhangzī bas-zhangzī bas “盖章”，gezīl lazī-gezīl lazī “红辣椒”，qiz sunzi-kez sunzi “孙女”等。

2.3.3 音译加注：

这类词在音译汉语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表示类属的撒拉语或西部裕固语解释性的词，以明确该词所指事物的类别或属性。例如撒拉语中 modan jījix “牡丹花”（modan 是音译汉语词“牡丹”，jījix 是撒拉语词“花”）；yūshī daš “玉石”（yūshī 是音译汉语词“玉石”，daš 是撒拉语词“石，石头”）；西部裕固语中，chengto daš “秤砣”（chento 是音译汉语“秤砣”，daš 是西部裕固语词“石，石头”）；sunshu derek “松树”（sunshu 是音译汉语词“松树”，derek 是西部裕固语词“树”）等等。随着撒拉族和裕固族掌握汉语的人不断增加，这类词的构词方式越来越少，有取消加注的趋势。

2.3.4 音译词加民族语构词成分：

这类词在吸收汉语借词后加上撒拉语或西部裕固语词缀组成新的词，有以下几种方法：

2.3.4.1 在汉语名词借词后加上附加成分 ji

在名词借词后加上附加成分 ji 表示“.....职业的人”。例如 seyfunji “裁缝”，xeyjangji “鞋匠”；西部裕固语在表示与动作有关的事物或从事某种工作的人，还可以在动词之后缀加 -ma/-me/-ba/-be，例如 joGe- “坐”，joGema “椅子”；gezǵe- “缝衣”，gezǵebe “裁缝”等，这种情况在包括撒拉语或其它亲属语言中并不常见。

2.3.4.2 在汉语名词、形容词借词后构加动词的附加成分

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动词的附加成分-a/-e 加在名词、形容词后构成动词。例如 jong-jongna/zhuangna “装”，yan-yanna “演”。

2.3.4.3 在汉语借词根词后，缀加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后缀构成动词

在汉语借词根词后，缀加撒拉语与西部裕固语后缀构成动词-la/-le/-na/-ne 构成动词。例如 bola “包上”，šele “卸下”，sola “锁上”，damna “担”。

2.3.4.4. 词序颠倒的方法：

汉语词进入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后，在使用过程中根据本身的语言特点及表达习惯改变汉语词汇的语序，例如 xui kela-xui kela “开会”，ot dele-ot denne “点火”，xeli dula-menek dula “赌钱”，shu jieje-pude jieje “借书”等等。

3. 结语

甘青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撒拉语、西部裕固语长期与汉语深度接触，二者在语音、词汇层面产生诸多趋同性演变。语音层面，两种语言新增 /l/ 音位且该音使用频次显著提高，同时产生舌尖后翘舌音、复合元音，形成清塞音送气对立；同音词数量增多，固有元音和谐规则不断弱化。词汇层面，大量跨领域汉语借词被借入，衍生出多元借词构词手段，部分本土固有词汇逐渐为汉语借词所替换。此类共有语言特征是区域语言接触催生的典型结果，充分体现了汉语对甘青地区突厥语语音、词汇系统的深层改造作用。本文通过对比梳理两种语言中的汉语借词，既能为中国西北区域语言接触、突厥语演变相关研究提供实证案例，亦可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传承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Clauson,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Harris, Alice C.&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2, 137.
- Tekin, Talat. "L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Simurg*, 1995.
- Thomason, Sarah G.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a, pp. 62, 69 – 71.
- 陈乃雄. 保安语的演变轨迹. 民族语文, 1990, no. 3, pp. 16-25.
- 陈宗振. 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语言研究, 1985, no. 1, pp. 206-214.
- 耿世民, 魏萃一. 古代突厥语语法.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 捷尼舍夫 ㊿. P. 撒拉语结构. 白萍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 民族出版社, 2002.
- 马伟. 语言接触与撒拉语的变化.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9, vol. 35, no. 3, pp. 29-35.
- 舍秀存. 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以循化撒拉语为例.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vol. 41, no. 4, pp. 118-127.
- 吴福祥. 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21, no. 4, pp. 23-33.
- 吴福祥. 试说语言的区域特征. 民族语文, 2025, no. 2, pp. 45-56.
- 徐丹. 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民族语文, 2015, no. 2, pp. 23-35.
- 赵相如, 朱志宁. 维吾尔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 钟进文. 甘青地区突厥蒙古诸语言的区域特征. 民族语文, 1997, no. 4, pp. 55-60.